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负责人推介



焦佩锋，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哲学。出版个人专著5部，主编、参编各类著作20余本，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 焦佩锋

2013年，在我博士论文《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又以“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并获得青年项目资助，此后，历时6年而不敢丝毫懈怠，始终本着严谨的学术精神和严格的学术规范来对待自己的论题与写作。

历程

就心路历程而言，对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自醒与自觉过程，这也许正契合学术研究由浅入深、由点及面、由外在审视向内在理解进行转化的基本规律。

于我而言，这种“开蒙”的过程表现为：在申请立项的时候，实际上还尚未从博士论文的框架中走出来。一方面，我的文献综述基本沿用的是博士论文阶段所搜集的材料；另一方面，我的研究提纲大约有60%的部分与博士论文的研究框架相似。实际上，这种状况既反映了我对历史主义问题的愚钝理解，也同时表现了年轻学者独立开展学术研究之艰难性。但是，学术研究从来都是一种思想的冒险和知识的更新，如果不敢从已有的学术理解中走出来，那么，我们既有

负于导师和学界的期望，也有负于学术问题本身。

源于这种无知无畏的思想冲动，在立项之初，就给自己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有意识地与博士论文区别开来。如果说博士论文主要是从唯物史观内部解释马克思历史思想的基本含义、理论表现以及对于唯物史观创立的意义，那么，本课题则是从唯物史观的外部——尤其是西方近代历史思想史的谱系中——开展对马克思历史思想的来源问题及其成果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比较马克思对历史主义的态度、辨析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就显得特别合理。二是，要有中国意识和当下情怀。我认为，做学问第一位的态度是先把自己“拿掉”，只有先“忘我”才能钻进问题本身。只有被其关注的问题反复折磨过的人才知道其研究的问题本身的厚度与高度。但是，作为一名党校教师，如果只满足于对问题及相关材料的梳理，那我们最多是一名知识的搬运工。在中央党校，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中国各个领域、层级和行业带着“热度”“鲜度”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和现实要求，因此，哪怕我们做的是平实冷静的思想史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缺少现实关怀。具体到本研究中，这种关怀大致可以转化为如下问题：马克思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和中国人所谓的历史主义是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基于对历史主义批判而形成的唯物史观学说观的历史科学性如何理解？这种科学性在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中有何表现，获得了何种认同与传播？对于解释学史学、后现代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质疑与责难，唯物史观如何基于历史话语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当然，对于这些问题，六年前的我还是一种懵懂的感知，但它们无疑是我超越原有博士论文研究的契机与起点。

基于上述考虑，在后续的研究中，我实际上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是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扩展性研究，其标志就是将历史主义问题从古典延伸到现在，撰写并出版了36万字的研究专著《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从而深化了对该问题的阶段性理解。

实际上，这一步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原因是，经过反复比较，我发现，如果仅仅将历史主义问题定位于19世纪固然可以与马克思进行贴合度较高的对话，它也有助于我们看清马克思对包括德国历史主义、英法保守主义在内的诸多历史主义路向的思想成果的批判性姿态的本质。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有较大发展，其显著标志就是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批判的历史哲学”，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如何自持？并且，这种转向所仰赖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的时代被如何处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20世纪西方史学和哲学的转向中如何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基于这些追问，我们就不得不将问题推进到20世纪，并及时向国家社科基金办提交了课题更名的申请，即将原来的“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关系研究”变更为“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关系研究”，此处，“当代”二字体现的就是这种论域的变化。

因此，就博士论文与国家课题之间的关系而言，作为中期成果的《唯物史观与当代历史主义》其实是对原有论题的继承和发展。在继承的意义上，其一，我深化了对启蒙辩证法理解与阐释，并且特别突出了德国版的启蒙和法国版的启蒙之间的差异性。其二，深入分析了古典历史主义的基本形式和典型样本，以区别于博士论文对德国历史主义的阶段化陈述。其三，系统呈现了马克思对古典历史主义存在论前提、国家目的论和方法论原则等三个方面的批判，以区别于博士论文对德国历史主义各个学派进行分门别类加以批判的做法。在发展的意义上，其一，对近代历史主义及其主观性特征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新康德主义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史学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扫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看清马克思之后西方史学的大致走向及其对唯物史观所形成的挑战。其二，对当代历史主义的发展状况进行扩展性分析。我们认为，德国历史主义由近代向当代的转向是以其遭遇的两次危机为标志的，对此，特洛尔奇和梅尼克都有明确的论述。其三，对现代历史主义所关涉的现象学、解释学和科学哲学等哲学思

想流派进行了针对性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较为充分地呈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大致走向与问题意识。

基于对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分析，我认为，唯物史观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不会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过世而随风飘散，所谓思想史的研究无非就是为了从一种跨时空的角度看待唯物史观在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的处境，具体是：从危机意识看，传统的唯物史观范式确实存在过于注重历史的客观性与规律性、历史的本质和结构、历史的过程与目标而较为忽视对历史的语言学、主体性和微观性解释等问题。因此，一方面，解释学史学、后现代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的确值得重视，但也折射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那种较为僵硬的面孔。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充分吸收当代历史科学和历史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唯物史观的本质意义必须得到充分阐释与巩固。在我们看来，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结构化、系统化和实践性三个维度。在此，结构化视角表现的是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系统化视角表现的是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的辩证原则和总体视野，而实践性实践表现的是其对待历史的生成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视角，它们共同表明了不同于具体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内在机理和整体图景。

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有了一个基本的分析之后，我发现，要澄明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既要看清其相对主义底色，也要看清其反历史主义面孔。所以，对于那些有志于深化研究唯物史观的当代学人而言，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感和比较意识其实非常必要，它是我们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一个必备的思想基础。

第二步是对历史主义进行了专题化研究，其标志就是基于五大专题撰写了一部24万字的研究专著《历史主义专题研究》，从而拓展了对该问题的关联性理解。

个人认为，从思想史梳理和历史思想比较的维度而言，之前对唯物史

观与历史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从技术操作的层面讲，因为要结项且深入研究的需要，还须再度深入到西方思想史内部对历史主义进行专题性研究。实际的情况是，历史主义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基于历史为现实进行辩护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史学领域，而且渗透于哲学、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使得哲学领域的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政治领域的国家主义和纳粹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变得可能。源于这个考虑，我就开始了以专题的形式研究历史主义的新阶段。

我的研究思路是：以历史主义所透显的历史意识为指引，以历史主义与历史科学的基本关联为基础，分别对其所关涉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纳粹主义等问题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以期全面呈现历史主义问题的跨学科特征。经由这些研究，我认为，西方近当代的历史主义并未超出马克思的问题域，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是古典历史主义主要的理论困境，而当代历史主义实际上也局限于这一困境。对于后者来讲，尽管其充分汲取了近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来对待历史，但是，在根本上，其对历史和现实持一种无批判立场，将其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而缺少了对历史的人类学分析和价值论理解。毋宁说，其长处在于事实分析，其软肋在于缺乏价值分析，他们的眼光历史的，也是当下的，但就不是未来的。所以，如果文德尔班关于历史的价值分析能被当代西方史学传承下来情况是否会好一点？当然，这种传承也需要从事实分析和价值分析相结合的视角来整体推进，并且，这个价值分析必须是以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整体关注才可能的，很遗憾，近当代的西方历史主义在此问题上着墨太少。

心得

做学问必须潜下心来，学术根底浅没有关系，学术悟性差也没关系，关键要看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态

度，很多大学问其实都是靠笨功夫和小学问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同理，做课题不能以结项为目的，而是要跟着问题本身把学问做出来。

其一，研究计划要有前瞻性。其实，博士阶段的研究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敲门砖”，这种研究只能说进入了问题，还不能说把握了问题本身。原因是，由于缺乏人生体悟，学生阶段的学术研究更多是一种从书本到书本的知识平移和观点归整。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同样是一本书，十年前读和十年后去读往往是两种感受；同样是一个问题，十年前的思考和十年后的思考也往往各有分别。当然，学术研究也没有这么大的跨越，毕竟书要一本一本读，问题要一点一点想，对于自己所钟情并熟悉的学术方向而言，既要立足自己研究的实际状况，也要充分考虑到学术问题的长远性和研究计划的前瞻性，而这种前瞻性往往是问题的新生点，要敢于结合这种前瞻性来扩充和指引自己的学术研究。

其二，要及时跟踪学术动态。在我看来，所谓的学术动态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针对问题本身的学术前沿，另一种是与本问题相关的学术前沿。为此，在平时，我们要及时花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和消化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材料，特别是那些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已经有深入研究的学术前辈的成果，以更新自己原有的学术认知和知识结构。当然，对于这些学术观点和见解，自己要有有一种批判性吸纳的态度，不能人云亦云。只有这样，学问才会越做越新，越做越深。

其三，要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问。学术研究从来不是抽象的活动，不同的学科、选题和学者既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多姿多彩，也往往意味着学术水准的参差不齐。作为一名年轻学者，要本着对学问负责、对学科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力争做出让自己能够看得上、说得清、有点用的学问，这种意义的学问与知识、真理和良知有关，而与金钱、名誉与利益无关。所以，无论何时获得资助抑或迫不得已而延期，只要不放弃对问题本身的持续关注与精深思索，那么，我们一定会做出让自己心安、让学界入眼、让后人认可的学问。

为实现校（院）“四个建成”目标提供高品质服务

□ 于 军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努力提供优质服务

强化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的关键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和领导力。具体到图书和文化馆，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科学技术新趋势，把握国家“两新一重”发展战略的重要契机，建设成为校（院）的精神家园、知识殿堂、历史宝库、文化高地，为实现校（院）“四个建成”奋斗目标服务，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与传播服务。

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讲政治，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认真学习、研究、阐释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这一伟大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牢牢把握校（院）的政治属性

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搞好两个建设。在图书和文化馆事业和图书和文化馆队伍的建设上，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党校人姓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一方面，打造联结人与人、人与图书、人与知识、人与信息的数字学习空间，建设“马”字号“党”字号资源完备、智库建设保障有力、文化交流成效卓著的图书和文化馆，为全体教职工和学员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把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成长尤其是青年人的学习成长作为图书和文化馆工作的关键支撑，对青年馆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业务培训，在培养上下功夫、在使用上求突破、在管理上强措施，积极为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搭建平台。

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当好理论学习“第一名”，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真理力量、道义力量、人格力量、创新力量，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讲好理论实践“第一课”，始终树牢立德树

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努力服务主业主课。抓好贯彻落实“第一棒”，紧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校（院）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把“一打纲领”变成落到图书和文化馆服务管理、业务实践、馆员队伍建设中的“一步行动”。

切实增强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

校（院）的第一属性是政治属性，做好校（院）工作的第一要求是讲政治。强化政治引领，就是要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图书和文化馆党的建设全过程。筑牢“用学术讲政治”智慧平台。“用学术讲政治”需要丰厚的营养田，也需要强大的能量场。要系统地搜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文献资料，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发挥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瞭望塔”“藏

书阁”和“研究室”作用。要建设彰显“马”字号“党”字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文献资源体系，以数字化、特色化为导向加强资源建设，加强馆藏文献开发与整理，不断夯实资源保障能力。要紧密围绕教学、科研、智库建设，将信息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上升到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层面，与校（院）发展协调推进。要充分发挥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势，整合资源，以行政促建、边建边享，形成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平台。

建好“党性教育”第二课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校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因党而强。党性教育是校（院）文化活动的核心内容，也是图书和文化馆文化展演活动永恒的生命线。要助力校（院）文化建设，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具有党校（行政学院）特色、突出党性教育主题的文化活动，用文化滋养党性，以博采众长的艺术形式开展忠于党和人民的教育、尽职尽责干工作的教育、道德情操的教育、拒腐防变的教育。同时，还要打造阅读推广品牌，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引导崇尚阅读，让反映政治机关、政治学校的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资源活起来、传出去、亮出彩。

在服务“四个建成”目标上布局谋篇

切实结合图书和文化馆职责定位，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与党校教育规律，顺应新形势、新任务与新需求，着眼于更好地提供系统、权威、高效、便捷的信息资源与数据服务，以“凝聚资源优势、善用技术手段、创新服务手段、加强协作共享”为工作重点，建立适应读者研究习惯与阅读需求的服务体系，更好服务于党校教学、科研与智库建设。

加强基础保障建设。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以云建设为基础，打

造智能支撑平台，建设智慧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提升资源建设能力和平台保障能力，将数字图书馆建成知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与传播基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信息资源高地、国内领先的新型高端智库研究信息情报中心、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文化交流共享平台。同时，我们积极适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现实需要，通过智能标签管理系统、智能盘点系统、智能机器人、智能借阅终端等，实现用户自助服务，提升业务自动化水平。持续推动空间改造升级，创设舒适空间，改善阅读环境，明确功能分区，建成集阅读、学习、研讨、体验、互动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场所。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馆长】



中央党校机关党委报刊社 合办